



“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传



SHIJIHUIMOU
RENWUXILI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吴立昌

藝、書、部、口、到、地、一、路、青、公、高、歌、木、末、白、唱、
 起、孤、村、已、老、旁、可、讓、長、山、何、處、苦、果、山、誰、敢、
 松、竹、各、爭、豪、走、托、部、日、漸、怕、波、十、萬、以、來、
 原、故、友、諒、此、來、病、鐵、鼓、沉、砂、久、聲、
 傳、主、區、難、一、拂、主、冰、心、玉、手、
 沈、以、會、部、口、六、年、冬、立、昌、
 沈、從、文、智、字、
 八、年、春、立、昌、時、年、七、十、有、九、

SHIJIHUIMOU RENWUXILIE

紀回眸 · 人物系列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传

吴立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

吴立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11 插页6 字数226,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5321-1112-1/I·833 定价：8.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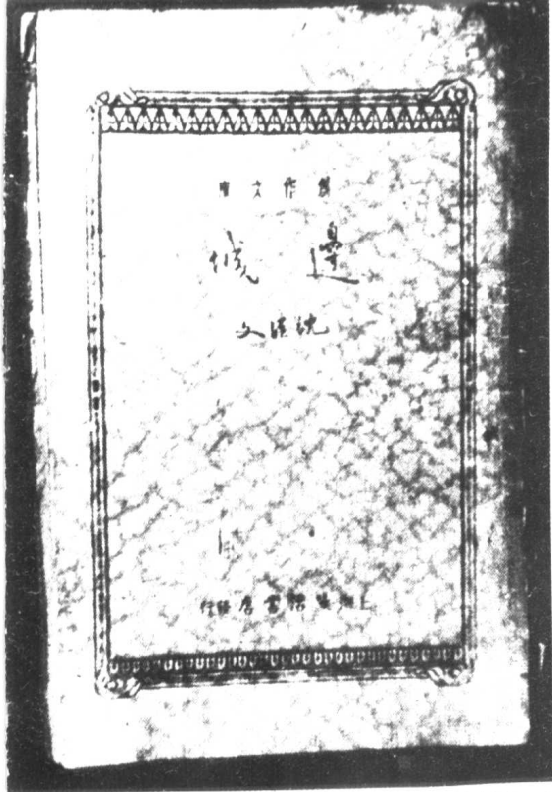


凤凰古城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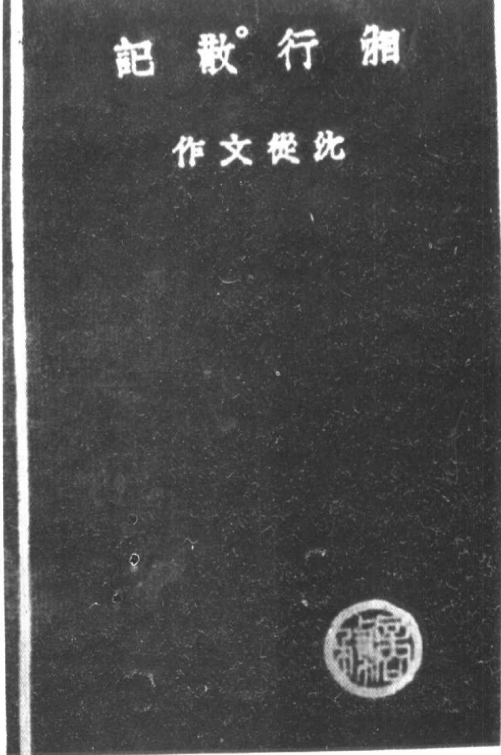


1932年在青岛

叶公超摄



《边城》1934年生活书店初版封面



《湘行散记》1936年商务印书馆
初版封面



1934年1月18日沈从文乘船返乡所绘沅陵附近景色



1956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时的沈从文

内山嘉吉摄

起：壽壽口口地一號青公高歌木末山鳴相起孤村已老
方可堪長竹勢若奔山徑疏處出松竹長了榮老托郭旧的
怕波十里以來的亭原蒼友誼此來高城我沉砂又替我修
市了休休之品難一揮盡湖山之上漁魚亦子帆還新婦

沈从文詩作手迹

沈从文詩作手迹

沈从文詩作手迹

沈从文诗作手迹



1982年 5 月重归故里摄于凤凰城北门外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骨灰由家人护送回故乡凤凰，一部分安葬于听涛山下，一部分由次子沈虎雏和孙女沈红登舟洒向沱江清溪之中

编者言

从今天起，——这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秒，我们都别无选择地朝着世纪末逼近着。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历史：现代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受尽磨难，至今方才徐徐拉开现代化的大幕。我们或可再问一声：这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序幕，是否延续的太久了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自今日始绕萦在人们心头，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口，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发出了类似的疑问，他们急躁不安，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壮行程，如同一道现代中国史上的深沉凿痕。本丛书的宗旨，正是要通过这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一个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下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

自序

“不虚美，不溢恶”，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写传记，必然要对传主作出评价；写文学家传记，必然要对其作品进行剖析。这一切均离不开实事求是原则。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事求是，这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问题，或者说一个作者的立足点问题。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在为重新发表《从文自传》所写的附记里，希望有人“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研究他本人。今年夏天，因他事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先生通信，她在复信中谈到沈从文研究，说：“无限上纲固然令人生厌，无限拔高也教人看了不舒服。但是，能够根据史实，时代环境背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准确公允的分析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在我们的文艺界，也不是一件易事。”两位老人的要求完全一致：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为传记作者，我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并尽可能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

前几年，各种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纷至沓来，文艺批评领域，更是异彩竞现。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

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派……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新奇是新奇了，但也会有一种无所适从之感。其中有些，我也曾接触过，有些只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有些几乎艰涩得难以卒读。不管怎样，在接触过程中，我也悄悄进行比较，发现这些文艺思潮和批评方法，确实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和长处。但是，当我有意无意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比较时，在一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上，还是后者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普遍真理。人们在谈论新的思潮新的方法时，往往会对过去作为文艺批评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屑一顾。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人们对于若干年前的文艺批评存有切肤之痛。不过，那时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偏离甚至阉割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深深陷入形而上学泥淖，它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批评，既要放开胸襟，广泛汲取近现代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文艺思潮的有益营养，更要首先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坚守它的基本原理，当然还要不断充实它，发展它。有鉴于此，我才进一步体察到为文时立足点之重要。不管“气候”如何变化，这个立足点不能动摇。“以不变应万变”，此之谓也。

中国现代作家，以鲁迅为首，凡有成就者，似乎开始都曾取法于外国，然后又逐渐摆脱外国的影响，但已将外国的有益营养溶解于自己的血肉之中，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其原因恐怕即在他们牢牢立足于各自所生存的现实土壤。当然，要达到如鲁迅（也应包括沈从文）那样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境界，毕竟不是一件易事，但确实是现

代当代许多有出息有成就的文学家所努力追求的。我常想,在批评领域,在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今天,能不能也将熔古今中外批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而又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显现本民族的特点,作为我们所追求的文艺批评最高境界呢?

写文学家传记,另一个需解决的问题是写什么。沈从文,别的不说,仅作品数量之多,就冠盖现代文坛,再加他一生是那样的浮浮沉沉,历尽坎坷。人,就是一个,但确定的中心内容不一样,写出来的传以及作者对传主的评价也不会完全相同。根据多年的观察和思索,我发觉沈从文一生的“贯穿动作”就是对人性的执意追求。他曾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因此我即以此作为本传的标题,同时也是全书写作的中心。在另一本有关他的书里,我这样写道:“如果说,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作是‘磨盘’,那么人性则是‘轴心’,离开它,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他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都可以说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辐射出来的。”他赞颂的是人性的美——淳朴、正直、善良、勤劳、忠贞、粗犷等等,他忧虑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形,他憎恶的是对人性的戕贼。这均有他的创作为证。与此同步,沈从文的理论和他在文坛的立身行事,则死死盯着“自由”二字。

不过,“自由”也还是从“人性”派生而出。因为在沈从文心目中,人性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之道,包括灵与肉的个性,应该能够自由地张扬。弗洛姆(Erich Fromm)有个著名论点,即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实现个性化,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产生了孤独感疏远感,因此就追求一种安全而又可依赖的生存

环境。人的行为动机就来自这种追求安全、逃避自由的欲望。沈从文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湘西到北京,目的在于“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从文自传·附记》)它的具体表现,则是坚持走一条自由主义文学之路。殊不知,一入文坛,他心目中的“自由女神”——文学立即撞上了它的“克星”——政治。然而,不管沈从文在文学同政治的齟齬碰碰中怎样的受到误解和歧视,他也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折磨,他的那个“抽象信仰”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这样说,沈从文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生,就是追求人性、向往自由的一生。本传写作中心内容的确定,一方面在于这是传主一生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解剖这一个“麻雀”,试试能否深一层去认识这个由“文学”与“政治”纠缠了几十年所形成的梦魇般的怪圈。

至于具体写法,翻翻坊间各种人物传记,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取那一种为好?与其在写法上煞费周详地去选择,倒不如暂且撇开他人,先自顾自地写起来再说。写好看,有的地方像评传,因为传主是作家,就不能不对他的创作及其在现代文坛的历史地位作一些必要的评述;有的地方像传记小说,因为传主的自传及有关文章或某些回忆录提供的材料,本身就十分形象生动;有的地方像年谱,因为遇到传主生活和创作中某些关键或转折点,又无需详尽描叙时,如果完全略去,就会出现不应有的空白;有的地方像作品提要,因为传主有些重要作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适当做点介绍,也许有助于读者的理解……结果就成了个“四不像”。

当然,我这样讲,并非提笔时没有任何考虑,真的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至少有两点是很明确的。如前所述,

我是扣住传主作为一名“人性的治疗者”而顺序铺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真实。我以为,既是人物传记,虽然做不到无一字无来处,但主要内容决不可掺杂任何想象和虚构,而必须有至少是我所确认的真实依据。最真实的依据自然应是传主自己的文章。别人写的回忆、访问、介绍一类文字,我也力求择取最具权威性的;凡发现文章作者有发挥创造性想象,甚至谬托知己的迹象,哪怕写得再详尽再生动,也只好割爱。其实,即使出自传主自己的手笔,有时也不可靠,特别是若干年后的回忆,往往与他当年的具体情境并不一致;至于别人的回忆之类,怎样才能具有权威性?怎样才能发现可疑之处?这都需作一番认真的考订。为了让读者读起来更顺当方便一些,我便将考订的程序置于幕后。这两点原则,在撰写过程中究竟兑现多少,只好有待于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严正批评了。

遗憾得很,沈从文生前,我因十数年未到北京,所以无缘识荆;再加怕攀名人的心理作怪,也没有想到如何主动积极地去联系。直到这位文学大师逝世,除了因别人的关系同他曾经有过一点间接的瓜葛外,可说从无直接交往。因此,本传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同沈从文过从密切的中外研究者那样,可以列出许多原始的甚至独家所有的资料。我所掌握的材料,都见之于公开出版物,特别是湘西吉首大学学报所刊登的丰富研究成果,谁想从本传中发现什么新的资料,肯定会大失所望,这是应该先向读者诸君致歉的。不过,退一步想想,只认文章不认人,也许感情的因素牵扯较少,如从另一个角度看,会不会还有点积极作用。因此,遗憾之中似乎又有些释然。

今年年初,曾从沪上报纸见到一则消息,说是台湾影视圈